

寻河探运

本报记者刘梦妮、张典标

冬日暖阳下，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的燃灯塔伫立在蓝天下。风轻拂过，塔身飞檐悬挂的风铃开始摇曳，不时发出悦耳的叮铃声。

过去，南来的跑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这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

2022年4月，全长约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水。人们不禁畅想从北京到杭州泛舟观光的场景，也会带着怀古幽思走进大运河的历史，从这条承载家国兴衰的“命运之河”中理解中国。

早在通水前，对于这条南北大动脉，考古工作者梁纪想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勘探过，摄影家刘世昭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记录过，作家徐则臣一字一字地考察书写过。

对他们来说，今年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梁纪想投入到通水清淤时挖出的沉船研究；刘世昭将自己跨越35年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珍贵照片捐赠首都博物馆；徐则臣仍在继续着他的运河文化探索与推广。在他们眼里，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不仅是人类伟大水利工程的历史见证，更承载着文化、历史、经济……滋养着运河两岸。

一个“运河考古人”的“执念”

在沧州文旅局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梁纪想看来，通水保护了文物。“大运河断流的时候，好多人在运河边挖掘当年沉船留下的铜钱、瓷器。现在通水了，这种现象也消失了。”

早在2004年，梁纪想就和同事踏上了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调查之路。

历史上的沧州因运河而兴。“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清代孙博的《夜过沧州》，为人们勾勒出当年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通航的美景胜境。

而当梁纪想他们开启调查时，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断流多年，“干涸的河道里长出了草，还有人在河里放羊。”

调查中，梁纪想见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人，都盼着运河能再次通水，“老百姓对运河很有感情，还口口相传着当年运河纤夫的故事。”

从沧州青县与天津交界的九宣闸开始，梁纪想和六七个同事分成两个小组，沿着运河两岸徒步走到沧州吴桥。

他们带着GPS、尺子、手铲、背包、相机等工具，白天做田野调查，晚上整理资料，2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他们走了一个多月。历史上这段运河弯多水急，这次调查的重点是那些不幸葬身运河的沉船。

“我们主要是探访运河两岸的村子，调查村里老人所了解到的运河沉船情况，包括沉船的位置、大概的年代，这些信息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梁纪想说，去年年初，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清淤时，在泊头挖出了一艘沉船，地点跟当年了解到的基本一致。

一个多月里，梁纪想和同事们记录下20多个沉船点。其中，大多数没有历史记载。

运河两岸废弃的砖窑，也让梁纪想印象深刻。“这些砖窑离运河特别近，主要是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摄。行驶在大运河上的货船通过杭州拱宸桥（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方便运输。”梁纪想解释，“烧制的砖专供北京城墙、宫殿和庙宇。每块砖差不多五六十斤重，上面还刻着年号。”

当时，村里好多老房子、围墙包括猪圈，都是用这些废弃的砖修建的。梁纪想他们收集了一些砖，送到省博物馆保存。

调查结束后，梁纪想辗转河北多地进行考古勘探，但一直没有离开运河。他曾在河北省大运河申遗办公室工作，亲历了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悦。

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沧州再次享受到运河水的滋润。

梁纪想的家离运河大约一公里，他晚饭后常常去运河边散步，“这一带现在漂亮多了，走在运河边，跟过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作为考古工作者，他希望所有的沉船一直安静地留在河底，“这其实是一种保护”。因此，他们当年调查出那些沉船点后，一直没有开挖。

泊头河道发现沉船后，他们赶到现场看到，部分沉船被挖土机挖出，已经能看见船板了。“我们先用水冲刷船上的淤泥，然后估量船体长宽，再在周围打木桩，把船整体吊出来。”

他们在上下游及沉船点附近都打了坝拦水，但大运河里有很多泉眼仍在冒水，导致沉船点附近的坝老是垮。梁纪想亲自下河，参加挖掘和修建河坝，“在泥里干活，我穿着雨鞋雨裤，还是一身水、一身泥。”

2021年，在沧州段南川楼建筑工地上，又发现两艘金元时期的木质沉船。沉船附近及船体上出土了铜钱、瓷器及其碎片。梁纪想说，金在北京设金中都，随后元朝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遥想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沧州的运河上络绎不绝。

目前，梁纪想和同事们正投入南川楼沉船发掘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除了拍照、录像、绘图、做标签、文字描述，他们还将沉船浸入纯净水池中，让碱和盐从沉船中排出。他解释说，沧州盐碱地特别厉害，所

以要对沉船进行排盐排碱处理。

神奇的是，经过排盐排碱处理的沉船，外观基本没有变化，“可见当年做船用的都是好木头。”梁纪想说。

一个“运河摄影师”的“骑拍史”

刘世昭也见识过沧州盐碱地的厉害。

1981年，这位《人民中国》杂志摄影记者第一次骑行京杭大运河时，吃得最咸的地方就是沧州。

刘世昭记得，一小盘青椒炒肉丝，一顿吃不完。因为吃着跟咸菜一样。在沧州沏茶，沏得再浓茶水也咸。35年后刘世昭再去，“就没这事儿了，菜不那么咸了，而且各种口味都有。”

两次骑行，刘世昭见证了运河沿岸和人们生活的变化。1981年，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搞不懂什么叫改革开放。2016年，运河沿岸人们的生活因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1年6月，33岁的刘世昭和文字记者沈兴一起，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骑行，一边骑一边在沿岸的城市、村庄采访。

他们避开了盛夏最热和寒冬最冷的时间段，将行程分为4个部分，历时400多天，在1983年1月到达杭州。

第一次骑行时还是用胶片拍摄，刘世昭不舍得随便拍。但整个行程也拍摄了3000多张胶片，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初期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

2016年春，已经退休的刘世昭，再次骑行京杭大运河。他直接从北京骑到杭州，历时68天，拍了718G照片，按每张照片10MB计算，粗略估计有七八万张。

两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让他欣喜，也让他惆怅。

他向记者展示的京杭大运河照片中，有张第一次骑行时在常州篦箕巷拍摄的。充满古典气息的江南水乡，沿岸民居与运

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中华“命运之河”的历史记忆也在疏通

记录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被绳子拴在船上玩耍。这是1980年代初跑船人的生活。为了安全，船家常把孩子拴在船上。

如今，船家都上岸安了家，这样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

“看到了，拍到了，记录下来，就觉得没白跑。”74岁的刘世昭，这样形容自己跨越35年的两次京杭大运河骑行。

第二次骑行结束没多久，刘世昭体检出癌症。“如果晚一年，估计骑行就干不成了。”他感慨地说。

好在他恢复得不错，现在出门也爱骑车，天气好的话每天都要骑上10公里。

今年，刘世昭将自己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照片全部捐赠首都博物馆。记者上门采访时，他正在整理胶卷，桌上堆着几十盒胶卷盒子。“作为摄影人，我要把见到的尽量记录、保存下来，因为这就是运河的历史。”

一个“运河作家”的“运河观”

梁纪想挖掘的运河沉船，也被作家徐则臣写进了小说《北上》。这本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开篇就是一份京杭大运河沉船考古报告的摘录。

徐则臣写了20多年大运河。大运河通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大运河已经死掉了一半，济宁以北早已断流，很多河道已经湮灭。”

如今全线通水，他认为也不能代表大运河的再生——通水只是物理意义上活了，更重要的是挖掘大运河文化和精神上的内涵，真正“唤醒”大运河。

其实，徐则臣对大运河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物理意义到精神意义的转变。

徐则臣的故乡在江苏东海。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一条运河。夏天在河里游泳、打水仗；冬天自来水管被冻住，大家拿着牙刷、端着脸盆在河边洗漱。“我从小跟水的关系就很亲密，那时河流对我来说，只是有用而已。”

18岁在江苏淮安上大学时，徐则臣第一次见到京杭大运河。“从我们校门往南步行10分钟，就是运河。一些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的古迹，比如清江浦、清江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当徐则臣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写起了运河。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写运河跟写别的河没有区别，“运河只是故事的背景。”

直到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徐则臣和出版社朋友聊天时撞击出火花，决定写一部关于京杭大运河的长篇小说，让运河故事由背景走向前台。

接下来的4年里，徐则臣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市面上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书，能找到的他基本都看了。刘世昭的《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他也翻阅过。

徐则臣还一次次从工作地北京出发，把运河沿线重要城市和水利枢纽走了个遍。他遇见很多在运河边画画和拍摄的人。在《北上》小说里，他创作了孙宴临这个人物。小说中孙宴临潜心研究过郎静山的摄影作品，而郎静山的家乡就在淮安。历史的真实和小说虚构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下转16版）

寻问文明

本报记者李坤晟、童芳

2022年1月31日，除夕。

一尊有3000多年历史的“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舞台。

造型独特的青铜器，神秘的古蜀文明——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自三年前被发现起，就被置于万众瞩目的境地。

机构媒体跟踪直播，自媒体跟进解读，“祭祀坑”还未发掘完毕，开播的相关纪录片就不下三部。三星堆堪称国内考古界近三年的头号“网红”。

2022年11月，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全部发掘完毕。在四川小城广汉，一群“90后”年轻人与三星堆的故事却远未结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传承的使命与担当。

给文物颁“身份证”

眼前这个小麦肤色的短发女孩，干净利落，浑身上下透着初生牛犊的真诚和锐气。

她是王瑞。在豆瓣高分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以下简称《不止考古》)中，这位常戴着一顶路飞草帽的“95后”考古职场“萌新”，曾满心欢喜以为挖到船棺

葬，却最终只收获三个空土坑。

错过2022年的雨季，10月中旬，王瑞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开始对月亮湾等几处勘探点进行发掘。

作为青关山勘探点的负责人之一，王瑞刚刚又遭遇了一场“打击”。

“我之前判断这边挖到第三层，就到了商周时期。但刮削的时候，发现里面插了一片带釉的瓷片，这下可能要到汉代都说不定。”王瑞指着前方一个十平方米不到的探方说。

被称作探方的土坑内部，四壁早被王瑞和同事向虹用铁签画好了分层。

一块小小的瓷片瞬间推翻了之前所有判断。

“有点失望吧？”记者道。

“是很失望！”王瑞将“很”字咬得很重。

不过，她很快接着说：“那一块瓷片能不能代表它的年代真的晚了？会不会是不小心混进去的？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

结果与预想不符，甚至做无用功，对考古人是家常便饭。田野考古能挖到陶片、瓷片已是重大收获。

像发现三星堆“祭祀坑”里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这样的“国宝级”文物，从某种意义上，必须得到命运的垂青。

参与了三星堆4号“祭祀坑”发掘的王瑞，自认足够幸运。

2019年底，在西南民族大学念考古学硕士的她，听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暗自思忖：这么重大的发现，不知谁有幸去发掘？

等到2020年秋天，听说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招聘临时工，她和同班同学向虹立马来到广汉。

“一开始不确定能不能留下来，也清楚只是做一些采样和记录工作，但能参与到三星堆发掘就足够了。”王瑞说。

采样，就是为发掘出土的文物和样品进行采集并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也被称为文物颁发“身份证”。

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意义。出土地层、坐标、方向、名称、种类、编号、遗迹号等信息均富价值，都需留存。据王瑞的记录，4号“祭祀坑”发掘过程中，采样的记录信息共有7000余条。

4号坑的发掘工作于2021年8月结束。在同样是“95后”的“坑长”许丹阳的主持下，4号坑出土了“铜扭头跪坐人像”等珍贵文物。经过历练，王瑞和向虹、傅悦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逐渐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原以为考古都是上年纪的专家在

一群“90后”让三星堆文物“活”起来
更多年轻人对文明源流的关注“热”起来

做，但我们做前期调研时发现了很多年轻面孔。”《不止考古》制片人顾苗丹说。这部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纪录片，因将镜头对准三星堆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而备受好评。

从2021年底到2022年5月，王瑞在燕家院子北边的勘探点主持发掘工作；进入雨季后，她和同事们窝在考古基地做资料整理；国庆假期后，则和“老搭档”向虹来到青关山。

在这里，两个女孩每天要指挥近40名当地村民开展发掘。

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二。田野上有可供考古人研究一生的宝藏。

“你们关注‘祭祀坑’里精美绝伦的文物。但对我们而言，它们只是遗物。考古要回答三星堆的古人是如何生活这些问题。”王瑞解释道。

勘探、发掘、分析、写工作日志……田间地头的工作按部就班，日复一日。与2021年参与发掘万众瞩目的“祭祀坑”相比，2022年的工作节奏才是三星堆考古人的常态。

在这个性格活泼的女孩眼中，成天趴在“祭祀坑”的大棚里提取文物，哪有田野上的工作有趣。

“在田野上，跟叔叔阿姨们相处。天天刮刮面、画画线，还能晒太阳。”王瑞说。

《不止考古》导演范承祥曾这样形容王瑞的工作状态：工作的时候，一点都不马虎。该批评的时候，她也会站出来。她年纪很轻，但是会学着领导的样子去做一个自信合格的领导。而放下身段的时候，又会赶紧做回晚辈的姿态。

在青关山，王瑞和向虹遇到拿不准的问题，两人就商量着来。

“决断力很重要。”向虹看了看不远处蹲在探方里的王瑞说，“我们有时很纠结。”

年轻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会主动地向师长请教：“挖不明白，就问冉哥嘛！”

2013年参加工作的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见证了三星堆考古十年变化。“我刚工作的时候，没什么现代化的设备，搞不了三维扫描。相机也特别老旧，经常拍不出好照片。人员分工更不可能，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干。”冉宏林说。

或许，正是这样的磨炼让今天的冉宏林成为后辈心中的“定海神针”。

（下转12版）